自序

動筆寫這本書始於 2018 年，寫了前面三章不到四萬字就停了筆，想是隨後接連而來的社會暴亂和新冠疫情令人心煩意亂所致。卻有幸在一群友人的協力下把原本想書寫的記憶由文字化成影音，2023 至 2024 年間拍成了《聲影路》，一部記載著我的成長與電影同行七十多年的紀錄片。但這並非我的傳記，也算不上回憶錄，因為記載不齊全，記憶也是零零碎碎的，只能算是一些感懷、一次回顧。

不少舊雨新知看過《聲影路》覺得素材相當豐富，全片都只通過個人的視角，以畫面（包含很多舊電影的鏡頭／片段）和音響（主要是我的獨白和配樂）展現我的往事，特別注重從戰後到九十年代我生命成長中的一些轉折，同時記錄了社會、時代和電影的諸多變幻，看上去有趣也有點意思。

但我也明白，這樣用不斷流動的影音砌造出來的記憶印象怎麼精巧也不免浮光掠影，總不及印刷文字的可供反覆閱讀、思索、聯想，乃至一再回味！

於是聽從了多位方家的建議，把書稿續寫下去，把一掠即過的影音印象用文字固定下來，更可擴充影片未曾探觸到的部分，豈不美哉！

終於完成了八章，從戰中淪陷時期寫到公元 2000 年以後。一如前面說過，限於經歷和筆力之不足，未能寫成自傳，即使是往事的追憶回顧，也是零碎而不全面的。大致上我是沿著兩條脈絡書寫的。其一，是我的成長環境時代變遷怎樣造就和制約著我的生活與事業，其間的互動關係。其二，是我和電影的緣分，相交逾七十年的景況。其間遇上的同事、友人（有不少是我景仰的前輩和堪足學習切磋的同輩以至後輩），以及一同致力的事業。後一脈絡是比較清晰的，那是沿著在崇基學院唸書時通過閱讀和交友接觸西方哲學和現代文學，畢業後進入《中國學生周報》工作並受其感染，從中領悟學習中西文化，愛上電影、寫作並組織「大影會」；踏著電影先輩前路、跟隨好友去羅馬漂泊，見識學習。回港後服務於無綫電視台；和一群同好新秀合辦香港電影文化中心；重操編輯寫作故業，由從旁參與香港國際電影節的建設到全職工作；然後 2000 年轉職香港電影資料館。其發展都與電影關係密切，而相遇、相交的同工、朋友也難能可貴地是一脈相承的！到了今天，不少親友、伙伴、同行者都已亡故，卻仍有不少健在，仍然時有見面歡聚乃至一起工作的！

全書分章敘事大體是順著年代時序的，當然有不少省略、前後跳動，更有橫向伸展的插敘：引用／轉載我不同年份寫的舊

文，有短評也有較詳細的分析報道。正文是比較輕快簡潔的，方便概覽式閱讀，引文則是專題論述，比較嚴謹專注，可供有興趣者對電影作進一步的參考研讀。如此夾敘夾評、輕快中穿插些嚴肅，是兼顧快讀和細讀兩種閱讀趣味，期望收到平衡雅與俗、輕快與細緻互補之效。

書中收入了大量圖片，也是同一意思，以圖樣的感性閱覽平衡文字的理性閱讀。由於是展示個人的視野、記憶、印象，敘事也由「我」出發，圖片中不免出現頗多的「我」。希望從中也看到由「我」帶出的許多人物、事件、景物和聯想，使得圖片和說明也起到增進趣味和訊息量的雙重作用。

人們讀回憶錄都想著看到某些人物、事件的底蘊，乃至內幕、秘聞。本書不是回憶錄，而所有記載或是事實或是近似的記憶，可供再加追尋實證，而自我警惕盡量少作猜想，更絕少負面風評和事後不滿的閒言、抨擊、訴怨。不必諱言，這是經過過濾的記憶，只選擇一些我視為有益而又有建設性的往事作出記載。這個世界太多隨時隨地看到聽到的圖象語言暴力、衝突、怨咒、煩惱了，不必再百上加斤。

就和拍製紀錄片般，本書的製作也有賴多位同工、友人的協力才得以面世。首先是金敏華君看過紀錄片後即席提議我把書稿完成並轉介給中華書局出版。大半年後全書終於付印了，但願最後成品不會令曾付出心力的出版者、編者、設計者和讀者失望。其中我要特別感謝長期協助我整理文稿的馬山君，他也是我八九十年代的工作伙伴，近年在《聲影路》放映場合重遇，是他一力推動協助我逐步寫出以至完成，並陪同我一道編校的。得要感謝老總黎耀強君和執編胡卿旋小姐，並請恕我的諸多需索和牢騷。

促成本書的面世還有很多直接間接在背後推動我的新舊相識友人，有借出圖文收藏的，有容許我引用的，更有不少是我私自利用了肖像未經圖中人同意的，惟有請海量包涵。在此不一一具名致謝致歉了，但願看到本書時能心領到那份可能還未好好表達出來的關懷和問候。

羅卡

自序於結婚四十九周年紀念日

第一章

澳門
童年往事

與父母和妹妹拍攝全家福。

少年幻影

陽光普照著澳門的大三巴，那高聳屹立的牌坊、長長闊闊的石級，象徵著澳門古遠悠長的文化和歷史。但在戰後，它只顯得空蕩殘破；而對於童年成長於此的我，它是每天都經過的一片殘骸遺跡，無所謂壯不壯觀。移居香港後多年，才逐漸認識到它的歷史文化意義，也喚起我對澳門的想像和記憶。

1966 年夏，我和石琪都正值青春年少，興高采烈的拿借來的 8mm 攝影機，用僅有的零用錢買膠卷，就拍起電影來。有了個故事大綱，沒有好好準備，就到澳門取景，大概因為我們都在澳門長大吧。石琪初當導演兼攝影，我出資、出主意當監製兼主演，就在大三巴開鏡。同行還有自願當助理的楊凡，還不到廿歲。三個人玩了兩天，膠卷拍了幾卷。回港後我們寫出了分鏡頭劇本《宿命》，找到何藩的表妹雷靄然拍了一天戲，卻沒有錢再拍下去，後來連那幾卷膠卷都遺失了，只曾在《70 年代雙周刊》發表了劇本。

2016 年，第一屆澳門國際影展首映楊凡導演的《海上花》（1986）新修版本。他請我在新聞發佈會上當主持，更邀請到主演者張艾嘉、姚煒、鶴見辰吾出席，共話當年。楊凡提到首次到澳門拍片，遠在《海上花》前二十年，說的正是我們去玩的那次。我會心微笑。

很湊巧，《海上花》有澳門一間酒店中發生的命案，我的短片中也有，卻是自殺的場面。是在我們住的小旅店房間裡拍的，我演出服毒自殺，為甚麼有這樣的安排我也搞不清楚。

1966 年 4 月天星小輪加價引發抗議騷亂，逾千青年人上街示威演成暴亂，有人死傷，有人被捕受審。也是這年夏天，陳寶珠、蕭芳芳的青春片掀起熱潮，每逢兩人的新片上映，各自捧場的影迷少女數以千百計，把戲院圍住，有如請願示威。石琪和我都熱愛電影和寫作，卻不是熱血青年，在此多事之夏，心情很迷惘。去澳門，與其說是自主拍片，不如說是散心遊玩。離開紛亂的香港回到童年成長地，也許潛意識上是「返回母體」的一種逃避吧。相比香港，澳門寧靜很多，一直處於低度發展狀態。若說香港是一叢紅彤彤的洋紫荊，澳門則是一朵躺在水上的睡蓮。

左起：羅卡、石琪、楊凡。

《宿命》劇照。

半掩臉的楊凡，攝於多實街 14 號後門。

戰爭中的澳門與中山

我是太平洋戰爭前一年（1940）在澳門出生的，此後和父母一直住在澳門。葡萄牙在二戰中是中立國，因此香港淪陷後，澳門未受到日軍侵佔，但實際上經濟政治都受到日軍的操控。其間

不少內地人和香港人來此避戰，或是經此由水路轉入中國後方和東南亞，一時人口大增，其中有大量難民，亦有來此找生活的三山五嶽人馬，正是龍蛇混雜，貧富懸殊。

我們一家住在接壤華界的青洲，靠爸爸教份窮書養活一家，生活困苦。媽媽背著才兩歲的我去輪米輪水，說我有過一次大病，倖免不死，又跌過落水給救回來。我此後一直有怕水的心理陰影，長大後幾次習泳都學不成，因為一落水就全身緊張。1944年美國軍機多次轟炸澳門接近華界的地區，據說有日軍軍火庫。因此青洲一帶也拉起警報。四歲大的我被媽抱住，棉被裹身，躲到床下底避轟炸！

爸爸祖籍中山，據說劉姓是大族，聚居石岐仁厚里，有個建築群。爺爺在鄉間擁有不少田地，是「大地主」，祖居在居仁堂，是座古老大屋。爸爸是長子，印象中還有六七個姊弟，他們都接受高等教育，過年和暑假都回老家探望，大屋有充足地方給各房子孫住。爸爸在全面抗戰前畢業於廣州中山大學，媽媽在香港成長，據說是在廣州認識爸爸的，不到廿歲就嫁了，然後定居澳門，大概是方便爸回石岐，也方便媽回香港探親。

媽媽在香港小家庭中成長，習慣比較西化的生活環境，每次跟爸爸回鄉，住入地主的大家庭中就頗不舒服。戰後四十年代石岐的衛生環境差，治安更差。我幼時幾次隨父回石岐探親，住在仁厚里劉族居仁堂的祖屋，是進了大閘門後有東廂西廂、天井和

中堂的古老大屋。印象都是可怖的：夏天蒼蠅特多，白飯放上桌面，瞬間就滿佈烏蠅，變成「黑飯」。

有一次，嫲嫲過世我們回去奔喪，其實是守喪，還記得她的遺體放在陰暗清涼的廳，棺木打開上蓋，任人憑弔了好幾天。我們一群同齡的表兄弟有時在廳房之間追逐，玩「躲躲貓」（廣東話叫「僕匿匿」），乃至躲在棺木下面。一次玩得快活忘形，跌倒在天井放置的雞籠（家人養雞自食，以竹籠飼養）之上，給露出的竹刀片割傷了臉，右頰血流如注。家人連忙用熟煙草為我敷

童年時與媽媽、外婆合照。

上止血，臉龐此後一直留下了疤痕。又有一晚，全屋眾人慌張，大門緊緊關上，說是有土匪在這一帶搶掠。長輩命令婦女和小孩都回房躲避，年輕力壯的就手持棒棍，準備土匪殺入時自衛。好在那次土匪過門不入，大家逃過一劫。

即使在淪陷期間爸也常回石岐看望老父，多次帶著我回去。那來往澳門關閘和中山石岐的長途巴士叫岐關車。三四歲的我頗有印象，車子破舊、道路不平，旅途上滿是顛簸震盪。某年炎夏回去探爺爺，車子途經日軍的檢查站，烈日下全車人列隊受檢，見到日軍要恭敬行禮，稍有不妥就給巴掌左賞右賞，也看到有給槍托狠打的，在我的幼小心靈留下恐怖的印象。

全家好不容易捱過那幾年飢餓恐慌歲月，1945 年 8 月，勝利終於到來了！那一年我才五歲。爸和我那年夏天剛好回到石岐祖居小住。某夜，街上擠滿點起火把慶祝抗戰勝利的人群，我在爸的肩頭上「騎膊馬」，置身點點火光的黑夜，在如江河的人群中川流擺盪，又驚又喜。類似的影象此後常在夢中出現！

戰後日子怎麼過

兒時的澳門生活卻不像夢境，而是活生生的記憶，年紀愈大記憶反而愈深，而且記得的樂事總比苦事多。澳門缺乏資源，工商業都不發達，葡國政府效率低，但靠賭博、爆竹、火柴、成衣幾個行業和港客過來遊玩消費勉強維持。好在人口少，中國人刻苦耐勞，生活清苦簡單總算捱得過去。不少家庭都接一些「手工業」，在家裡男女老幼齊齊開工：糊火柴盒、剪線頭、紮炮仗紙筒、貼招紙，人工很低，但眼見手到，人人會做；一邊做一邊閒話家常、聽粵曲。

我家成員只三人，爸平日去了教課，回家又要改卷，六七歲大的我放學後在家，不用接這些散工來做。媽煮飯洗衫做家務時從旁幫幫手就好。四五十年代一般窮等人家用不起火水爐，更不用說電爐，煮飯都燒柴或炭。一度流行用木糠爐，是高身的瓦爐，中間有個孔，其餘空間塞滿細小的木屑。燒起來全爐通紅，但熱度維持時間不及柴炭之久，卻比燒柴炭便宜。我滿有興致看著大人們「發火」，柴、炭、木糠的點燃方法各有不同，就中燒柴最花工夫：先要把送來的柴曬乾、破開，用破布爛紙引火燒起柴火，之後用火筒吹風、用葵扇煽風，是為「透火」，煽風點火後還要添柴睇火，煮飯做餸有個過程。年紀稍長則學懂了破柴、

煲水、煮飯，自己洗衫、曬晾以至熨衫，學做家務頗有趣，也不以為苦。

戰後到五十年代爸爸在澳門教中學，生活勉強維持，一家搬回市區居住。新勝街是大炮台山下的長街，我們租住的是中西式混合的古老大屋二樓，入門先上一條寬長的石級，揭起一道有蓋的活門通上二樓，全層有千多兩千呎，三大房一小房，可住三到四伙人家。高樓底，兩邊窗戶都向街，光線通風都好。只是房

舊日澳門街頭。（擷取自《聲影路》）

間是木間隔，頂部通風，平日高聲談話隔壁聽得到。廚房是公用的，樓下有天井供打水洗衫破柴，就只沒有廁所，家人各自在房中方便，儲在一桶，半夜有「夜香婦」來收集清潔之。這般居住環境已不算差，比起同期寸金尺土的香港是好多了。

我起初上的是天主教望德會辦的望德小學，教堂就在旁邊。每天早上走過瘋堂斜巷那長長的石梯和碎石砌的斜坡路，走走跳跳倒很有趣，學校就在路的盡處。

這街道在粵語片《一水隔天涯》（1966）中一再出現，又在日本黑幫片《雙雄喋血記》（1964）中現過形。職業殺手高倉健在港澳完成任務後發覺被人利用，收不到錢，更身陷黑幫與刑警追逼的困境。他落難到澳門，遇上同是天涯淪落的日本妓女，又和追蹤而來的刑警惺惺相惜，最後隻身勇闖虎穴了卻恩仇，卻一去無歸，徒令立在碼頭的佳人佇候。石琪、吳宇森和我都被影片的江湖道義與澳門的情景交融深深感動。幾年後我為導演龍剛寫了一個殺手的電影故事，只是寫得很不專業，未被採用。之前石琪和我去澳門拍的《宿命》就受到此片的啟發。

至於吳宇森，他也提過自己編導的《喋血雙雄》（1989）的人物和情節都受惠於法國片《獨行殺手》（Le Samourai，1967，尚彼梅維爾—— Jean-Pierre Melville 導演），而 2024 年再拍的新版《喋血雙雄》（The Killer）索性以法國為故事場景。然而，片中那份殺手與刑警的情義卻滿有《雙雄喋血記》的感動。吳宇森

很喜愛高倉健那外剛內柔的形象，我想也是自本片始。他一直想和高倉健合作，可惜他要重拍高倉健主演的《追捕》（1976）之時，高倉健已不在人世了。

瘋堂斜巷和 8 號的婆仔屋，如今成了澳門的旅遊景點。望德的校長李仲漁神父辦校很嚴，對遲到或不聽話的小學生施以體罰，又多方要求學生信教。父親不同意，之後我轉校到父親任教的廣中中學小學部，讀到 1951 年畢業。

那時市面蕭條，車輛很少，街上到處可以追逐玩耍。和鄰居孩子在馬路上玩「十字剁豆腐」、捉迷藏是指定「課餘活動」。那些年一般家庭都養幾個孩子，家計緊絀，勉強只能供長男長女上小學，而且總是男孩優先，女孩往往留在家中幫忙家務。「學前教育」就是幫忙洗衫煮飯，有空就和鄰居遊玩。我比較幸運可以由小學一直讀完中學。同學都懂得騎單車，我初學常常跌倒，不喜歡運動的父親以危險為由不許我再學下去，又不許我和同學到海邊習泳。不能騎車又不懂游泳，惟有以走路與行山為樂，放了學就和同學環島走，由南灣走向西環海邊，看人垂釣，看人下網捕魚，沿著伸出海岸的石堤往海中心走，在暖和的陽光海風中享受自由自在的時刻……然後沿著海岸蹓躂，經過媽閣走回下環。那裡一邊是魚欄、賣海味鹹魚的店舖，臨河的一邊佈滿和內地通貨運的小碼頭，一直伸延到新馬路的尾端，我再沿著新馬路走回南灣。這樣環島走一遍只需一小時多些。

花王堂區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十九周年。右邊可見德明中學招牌。

畢業證書

學生劉[illegible]係廣東省中山縣人

現年十二歲在本校高級小學

部修業期滿成績及格准

予畢業此證

澳門公教中小學校 長劉平祐

一九五一年六月廿九日

姓名劉[illegible]

籍貫廣東省中山縣人

年齡十歲

級別高中一

左：廣中中學小學部畢業證書，1951 年。
右：德明中學學生證。